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政治文化变迁与 中俄关系的演变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 高 飞 著



世界出版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 关系的演变

(1949—2008)

高 飞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1949—2008)/高飞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8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012 - 3395 - 3

I. 政… II. 高… III. 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1949~2008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904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文字编辑 杨志芬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封面设计 徐威明

书 名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1949—2008)
Zhengzhi Wenhua Bianqian yu Zhong E Guanxi de Yanbian
(1949 - 2008)

作 者 高 飞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19 $\frac{3}{4}$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395 - 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黄金时期”的第二层含义是热情高。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旺盛的需求，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

为满足上述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金时期”的第三层含义是影响深。影响深是指在今天中国和世界形势下,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是国家所需要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第二,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外交一线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进入了一个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无论是在外交理论方面还是在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要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外交一线的同志每天都有大量的事要处理,很少有时间对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而我们在外交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同志则不同,我们能够坐下来对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思考和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外交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处理好这些课题需要好点子,需要一些长远的思考和眼光。此外,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概念和理论,都会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需要我們进行观察和研究。

第三,丛书的出版也是外交学院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学。外交学院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建新校园,师生的数量都要增加,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对外交学院学术研究的大力资助;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同时,我还要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反映了本院老师和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对问题的研究,进行独立思考所提出来的,都属于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06年10月于北京

序 言

一

自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至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友好结盟。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 年 10 月 2 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 2 月，中苏签署了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该承认，条约对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战后远东与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苏结盟友好的背景下，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包括 149 项大型企业，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重新做客观分析，结盟政策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在党和国家关系上“称兄道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并不可取，也不科学，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

60 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从 50 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1960 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方搞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世界战争”，由此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随着两党意识形态论战，中苏两国关系也日趋恶化。1960 年 7 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双边协议

和合同。同时,在新疆地区挑起边境纠纷。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以期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苏联新领导人拒绝改变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随着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还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两次边境军事冲突。回顾整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文革”中,中国外交也受到“左”的干扰。

70年代是一个转折时期,形势变化微妙。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毛主席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中苏敌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在中苏对抗最尖锐的年代,两国关系只剩下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和“一个使馆”,而且没有大使,只留下临时代办,各方面的人员往来很少,中苏同盟名存实亡。1979年4月,中国以全国人大决议形式宣布,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及条约本身遭到践踏,决定198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通过外交途径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进行谈判。1979年9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国家关系谈判。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谈判中断。

80年代,中苏两国都调整政策,关系渐趋缓和改善。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中苏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1982年8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中方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同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中苏之间也由此改变了一个时期以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持状况,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往也逐渐增多。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这是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对华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并在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方面做出了实质性表态。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然而,1989年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基本原则却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为后来

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访问中国。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通过高层会晤，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打消了彼此隔阂。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双方决定，承前启后，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

1994年9月，应叶利钦总统的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回访。这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俄。此访的主要目的是，从面向21世纪的战略高度，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途径。在会谈中，江泽民对叶利钦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两国的关系逐步走向成熟。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精心培育和发展下去，带入下一个世纪，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和《中俄国界西段协议》等重要文件。两国领导人宣布，中俄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将两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进一步提高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将未来的中俄关系定位为战略关系。

从1992年中俄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1996年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年内，两国关系上了三个台阶。

在世纪之交，俄罗斯总统易人，普京接任新总统。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俄，同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个条约摒弃了过去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特征，体现了新时期

的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3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国家即包括俄罗斯，再次表明了我国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

2004年10月，普京总统应邀来华访问。除中俄联合声明外，双方还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标志着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已经最终全部确定。这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精神的具体落实和体现。它不仅消除了两国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隐患，而且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三

近17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中俄两国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关系并未受到影响，而且持续、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摒弃意识形态旧思维，坚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中苏关系从友好结盟到恶化对抗，再从缓和改善到重归于好，充满了戏剧性的复杂变化。其中固然存在客观因素，但进行冷静反思，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意识形态问题首当其冲。198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无论对中苏两个主角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大论战带来的消极后果都是严重的。在党与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不能再以意识形态划线，搞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况且，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脆弱的，也是靠不住的。

从现实情况看，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国与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正是由于认真汲取了历史上深刻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执行关于韬光养晦、超越意识形态的方针政策，我们才在逆境下顶住了冲击，站稳了脚跟，发展了自己，并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从容趋利避害，化挑战为机遇，不断有所作为，最终赢得了今天这样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50多年来的中苏（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外交学院青年学者高飞所著《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

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探讨研究发展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晓沛

2008年5月



高飞，外交学院副教授、博士。历任该院外交学系外交学与中国外交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副处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

教育和访学背景：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外交学院、法国巴黎十一大学访学。

主要学术成果：《百年中俄关系》（合著）、《外交学译丛》（主编）、《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合译），以及学术论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评中国外交的策略调整》、《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俄罗斯视角》、《俄罗斯离WTO有多远：俄罗斯入世的历史、问题与前景》、《朝共体系的历史流变与现实意义》、《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浅析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技术进步在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进化论与国际政治》、《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等。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 1 章 政治文化的概念与理论 / 11

第一节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 11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体系、单元与结构 / 18

第 2 章 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

中苏同盟的建立 / 28

第一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文化体系与结构 / 28

第二节 历史传统造就的中苏民族文化特征 / 44

第三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文化认同矛盾及其解决——

中苏结盟 / 51

第 3 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矛盾的凸显:中苏分歧与冲突 / 68

第一节 中苏分歧的政治文化成因及实质 / 69

第二节 中国对苏联的地位威胁和政策挑战 / 88

第三节 苏联追求苏美领导世界及其对中国的伤害 / 110

第 4 章 政治文化冲突解决模式的失效: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

国家关系恶化 / 121

第一节 国际共运的论战传统与中苏大论战 / 122

第二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 / 131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国家关系恶化的政治文化

解释	/ 140
第5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重塑:从军事冲突、国家对抗到 关系正常化	/ 147
第一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对抗	/ 147
第二节 中苏国家定位的疏离	/ 170
第三节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 179
第6章 建构合作的文化: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	/ 195
第一节 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变	/ 195
第二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202
第三节 从国家的友好到人民的友谊——中俄互办国家年	/ 226
结论	/ 239
附录 1949—2008 年中俄(苏)关系大事记	/ 256
参考资料	/ 277
附录一	/ 295
附录二	/ 297
后记	/ 303

前 言

1949 年以来的中俄（苏）关系的演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案例。1950 年 2 月 14 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在 19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一度只剩下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和“一个使馆”，高层往来完全中断。1980 年代初中苏两国接触开始不断增多，1989 年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92 年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两国关系界定为“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战略协作伙伴”。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50 多年来中俄两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热到冷，又从冷到热，中俄（苏）关系演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一、研究现状和本书的创新

对于中俄（苏）关系演变的原因，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一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他们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

益的矛盾角度,认定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全面冲突的萌芽。^①二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他们或者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②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19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Zhang Shugu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Zhang's another book is *Economic Cold war*, 2001.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R. 麦克拉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William E. Griffith, *Cold War and Coexistence-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entice-Hall, INC., 1971; John G. Stoessinger, *Nations in Darkness: China, Russia and America*,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1; Robert S. 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ited,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1; David Allan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55*,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英) 琼斯·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美) 高沃龙 (Garver, John):《对手与盟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德) 迪特·海茵茨希 (Dieter Heinzig) 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② 如:〔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中苏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中文版。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版的最新中苏关系著作,如:《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巴扎诺夫:《中国及其外部世界》,莫斯科,俄文版。(俄) A. M. 列多夫斯基 (A. M. Ледовский):《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Бажанов Е. П.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Отношения.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Новая и Внешняя История*, 1989; Рябченко Я Н.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50-х-начале 80-х годов*. Влодивосток, 1991; Л. Н. Нежинский. М.,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 - 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Отв.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И. Г. Лобода. *Москва-Пекин: Что дальше?* М.: ИНФРА-М, 1995; А. А. Брежнев,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98;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1999; Б. 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О. Б. Рахманин, *К Историй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20 Веке*,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2002.

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①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即认为，地缘政治和势力均衡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和追求目标，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形势的改变、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对国家利益认知方面的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但是，从19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在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中苏双方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本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仍然是中苏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敌人，对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合作显然更符合双方利益的需要。因此，通过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苏分歧是不充分的。另一种方法是理想主义的方法，即认为，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引起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戏剧性变化。问题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一定会恶化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1960年代苏美和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别要远大于中苏之间的分歧，为什么苏美、中美之间可以走向缓和，中苏之间却走向了冲突？这一点通过分析意识形态的矛盾性也无法解释清楚。第三种方法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心理研究。目前，中外学者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微观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通过研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关系变化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决定了当时中国对苏联的策略。^②同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注重分析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路线与对苏态度和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③有的强调毛泽东的革

① 回忆性著作如，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学术著作如，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杨闻：《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②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③ 章百家：《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分裂》，“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10月；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①也有的将毛泽东的政治意识作为思考问题的角度。^②但是,目前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人个性等方面,没能够从领导人政治意识产生的宏观文化背景进行研究,这有可能将中苏关系演变归结为个人性格,陷入苏联学者认为的“领导人个人的原因”导致了中苏关系恶化的老路。德国的海茵茨希在研究中苏走向同盟的历程中使用了部分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研究止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没能展示政治文化的差异如何在中俄(苏)关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此外,过去的研究多从中苏双边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的演变,这也有一定的局限。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约和经互会相继解散,然而与其对立的北约和欧共体(欧盟)却不断发展完善,2002年又分别做出了东扩的决定,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反倒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团结,原因究竟何在?这一点从过去的研究来看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③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蒙古迅速增长到十几个,并在冷战的气氛下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然而,纵观社会主义阵营“生命”的全过程,问题始终不断。1948年欧洲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8年苏南、中南论战,1960—1964年的中苏论战、苏阿论战,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战争等一系列冲突事件很自然地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演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并非特殊个案,而是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与冲突关系的缩影。

由于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摩擦存在普遍性,那么我们单纯地从中苏两国去寻找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无异于缘木求鱼,答案只能从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中寻找。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参见安大峰:《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5期;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动一动手指头就能让铁托永远滚出去”,“这种情况难道仅仅限于一个南斯拉夫吗?”参见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页。